

#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迟成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 江苏 南京 210031)

**[摘要]**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关键词]** 张岱年;现代新儒家;儒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5)01-0017-06

张岱年(1909—2004年),河北省献县人,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张岱年先生总结自己平生学术活动为三个方面:一为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为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三为文化建设问题的研讨。纵观八卷本《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无论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还是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抑或是文化建设问题的研讨,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学术文化资源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张岱年先生对儒学的研究,有力地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

张岱年先生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既不赞同儒学复兴论,也不否定儒学的现实价值。从与现代新儒家交往来看,张岱年先生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张岱年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研究儒学的杰出代表,但却不归属于现代新儒家学派。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它们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

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1.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

张岱年先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研究儒学的杰出代表,但却旗帜鲜明不认同现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儒学复兴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既有全盘西化论的激进主义浪潮,也有儒学复兴论的文化保守主义情结。张岱年先生既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并不赞成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约在1988年前后,反传统的浪潮风起云涌,黄河长城都成为诅咒的对象,不少人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甚至愿当外国殖民地的顺民。有些讲哲学的专门从希腊讲起,根本不提中国的哲学,好像中国几千年来是一片荒漠。”<sup>[1]520</sup>张岱年先生结合当时的反传统思潮,批判西化论者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提出要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同时还说:“近几十年来,与反传统思潮对峙的是国粹主义,很多港台学者提出所谓儒学复兴论,认为民族的复兴还要依靠儒学。事实上,儒学是适应过去时代的思想体系,时异势易,儒学不可能提供从根本上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案。五四运动以后,儒学作为主导思想的时代

**[收稿日期]** 2014-09-15

**[作者简介]** 迟成勇(1966—),男,安徽合肥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儒家文化。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sup>[1]195-196</sup>1989年,台湾《鹅湖》月刊分两期连载学者蒋庆撰写的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论文《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有人将之于1958年在香港《民主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港台新儒学宣言》相提并论,称之为“大陆新儒家宣言”。自此儒学复兴论颇有一定的学术市场和学术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先生,极力关注于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提出谋求“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愿望或前景,而且着力描绘“文化中国”的设想和展望。从总体上看,儒学复兴论者试图论证中国传统哲学与后现代主义颇相契合,借此发掘儒学的后现代价值,或者说在回应西方文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批判中试图重建儒家思想系统。现代新儒家致力于复兴儒学,其价值取向就是“返本开新”,即返传统儒学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或者说“内圣之王”可以开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儒家“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其实,任何一种学说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本身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今天和明天的全面问题。同样,儒学是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时代产物,在今天,它已经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依托,复兴儒学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供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案,而只能作为文化学术传统为当代学者予以批判继承,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智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资利用的有价值的文化资源。

张岱年先生说:“进行现代化建设,复兴儒学固然不能解决问题;全盘否定儒学,便将丧失立足的基础。我们努力创造中国新文化,只能在已有的文化成就上继续前进,对于传统的儒学还应批判继承。”<sup>[1]79</sup>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研究,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不赞成“儒学复兴论”,足以表明张岱年先生对儒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有着一种理性的认识,而不同于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立场。从如何对待儒家文化来看,在“全盘西化”与“全盘肯定”的学术张力中,张岱年先生一方面继承儒学优秀传统而又不为旧的传统思想所束缚,另一方面汲取西方文化思潮的先进成果而又不为新的唯心论所迷惑。从方法论角度讲,张岱年先生对儒学作了“全面的辩证的解析”,既着力于传统儒学精华的发掘与弘扬,也注重其缺陷或腐朽成分的发现与批判,同时还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时代提升。可见,张岱年先生侧重于儒学研究,但又不等同于现代新儒家学

派。而张岱年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诠释儒家文化,开拓了研究儒家文化的新境界,进而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

## 2. 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现代新儒家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后,凡是传承儒家之“道统”者,都是儒者或归属儒家学派。“五四”以来,形成了以传承宋明理学为己任的儒者,称之为“现代新儒家”。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特征主要体现为:一是自觉地继承宋明儒学的“道统”,二是认定儒家文化为中国的本位文化,三是以儒学价值为学术终极目标,四是以重建儒家思想系统为学术使命,五是以“返本开新”为学术价值取向。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

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在《散文型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一文中记叙道:“在一次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中国孔子研究所的会议(北京孔庙)上,我问张先生:‘学术界有人想将您也列入当代新儒家。您有什么看法?’张先生大声说:‘我不是新儒家!’又指着我说:‘你也不是新儒家!’我说:‘我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并不是新儒家。也像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只是说了一声‘是’。”<sup>[2]324-325</sup>张岱年先生认为,现代中国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人,都是继承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中的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思想。其中,冯友兰先生接着程朱讲,贺麟先生则倾向于陆王,熊十力、梁漱溟两位还兼采佛学。总之,他们的哲学体系都是唯心主义的。张岱年先生说:“冯友兰著《新理学》,自称是‘接著’程朱讲的,而不是‘照著’程朱讲的。……‘新理学’是程朱学说与新实在论的结合。”熊十力“著《新唯识论》,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新唯识论》宣称‘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境识同体,本无内外’,实为一种唯心论。”<sup>[1]535-536</sup>而张岱年先生强调自己注重中国的唯物主义传统,如张载、王夫之等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从弘扬儒学的路径或方法来看,张岱年先生既不“照著程朱讲”也不“接著程朱讲”,而是有所“损益”,即在批判继承儒学优秀传统的基础进行综合创新,建构起“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思维相结合,并吸取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人生哲学,以及西方的历史唯物论和逻辑解析方法,使之融为一体”<sup>[3]</sup>的哲学体系。

在儒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路径方面,张岱年先

生强调,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评论。”<sup>[4]306</sup>可见,张岱年先生对儒学的研究,显然区别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立场、方法和学术旨趣。或者说,张岱年先生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不同于现代新儒家完全采取的正的方法,而是既有正的方法也有负的方法,既充分肯定儒学的正面历史价值和现实的理论价值,也明确指出了儒学的历史局限和思想欠缺。由于张岱年先生在儒学研究的方法路径和对儒学价值的评价上显然不同于现代新儒家学派。因此,张岱年先生在学术派别上显然不能归属于“现代新儒家”。有学者指出:“张岱年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诠释儒学的杰出代表。”<sup>[5]</sup>简而言之,张岱年先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儒学,发掘儒学的现实价值,既不是以儒学价值为终极关怀,也不是以重建儒学系统为根本的学术使命,而是为建构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服务的,更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文化资源。无疑,张岱年先生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派,而是新时期研究儒学的杰出代表。

### 3. 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现代新儒家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而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但张岱年先生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曾经提出质疑甚或予以否定,其间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中说:“西方人所说的‘新儒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宋明理学,另一个是指所谓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在国内又有人把‘五四’运动到解放前的四位重要学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先生说成是‘新儒家’。这个观点我不赞成。”<sup>[4]212</sup>1988年7月在《谈中国传统哲学与自我实现》中又说:“近年海外一些华裔学者谈论儒学新发展的可能性,国内也有人把几个老学者称为‘新儒家’。我不同意儒学新发展的议论,也不同意把一些老学者称为‘新儒家’。”<sup>[4]305</sup>张岱年先生之所以不同意把几位老学者称为“新儒家”,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贺麟在不同程度上转变了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过去的同情理解转向认同和接受,贺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随着现代新儒学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学术论争的深化,张岱年先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或认

识。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展示——评介〈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和《关于新儒学研究的信》等文章中修正了自己关于“不同意儒学新发展”的观点。张岱年先生说:“十几年前,旅美学者杜维明曾著文论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在现在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不仅可能,已成为历史事实了。30年代以至80年代,确有一批学者可以称为现代新儒家”。“冯友兰于30年代著《新理学》,自称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程朱是宋代新儒学,接着程朱讲的当然可以称为现代新儒家”。现代中国新儒家,在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勱、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八大家之外,“还有马一浮、贺麟,也都是值得研究的。”<sup>[6]435-436</sup>在《关于新儒学研究的信》中又说:“我现在认为,‘五四’以后确实形成了一个新儒家学派,这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对新儒家的研究还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新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成果,应当给予客观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应当肯定新儒家不是顽固派,他们对西方哲学也很了解,对西学并不一般地采取排斥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他们主张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sup>[7]</sup>张岱年先生承认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存在,但批判其唯心主义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当然,出于地域政治的缘故或者学术立场的信念,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海外新儒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港台和海外新儒家,面对儒学“花果飘零”的局面,在坚持复兴儒学的价值立场上,在哲学思想上拒斥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把新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的鲜明倾向。

总之,对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反映了张岱年先生作为哲学家尊重学术研究的新进展,勇于修正自己观点的求实精神,更体现出“修辞立其诚的”的治学精神。同时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也体现张岱年先生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和方法的本质区别。

### 4. 张岱年先生与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

尽管对儒学研究的立场、方法及价值取向不同,但张岱年先生始终与同时代的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三位先生保持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与新儒家的友谊是学术交往的前提和基础,与新儒家的学术交流则是友谊的深化和提

升。无疑,与大陆现代新儒家的交往,对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体系建构和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张岱年与熊十力之间的友谊和学术交流,最早可追溯到1931年。其时,张岱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熊先生看后对张申府说:“我想找你弟弟谈谈。”于是,在兄长张申府的介绍下,张岱年拜访了熊十力先生。后来张岱年先生在《研习哲学过程杂忆》中写到:“1931年开始,我常常向他请教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问题,很佩服他创立‘新唯识论’的理论勇气。但我不同意他的‘境不离识’的观点。”<sup>[6]463</sup>此后,只要熊十力先生在北京,张岱年大约每半年去拜访一次,主要探讨有关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问题。1956年,党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张岱年先生非常高兴,欢欣鼓舞。后来张岱年先生记叙道:“嗣后,我访问熊十力先生,谈到‘双百’方针令人鼓舞。熊先生告诫我: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sup>[8]</sup>可见,张岱年先生一直保持着与熊先生的友谊和学术交流,也体现出熊先生对后辈学者的关切。1985年又撰写《忆熊十力先生》一文,认为熊十力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之一,早在30年代就提出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新唯识论”,构筑了“融合儒佛”的哲学体系;在50年代至60年代,熊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摄体归用”的实体学说。张岱年先生称赞熊先生,“著作丰富、内容宏博奥渊,确有甚深意蕴。”<sup>[6]460</sup>

1988年撰写《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认为梁漱溟先生,不仅是“蜚声中外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而且“是为民族自救、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积极奋斗的爱国思想家”,“更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梁先生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能坚持所认识的真理,无所畏惧,此种坚强不屈、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更是令人敬佩。”<sup>[6]461-462</sup>

在与现代新儒家的学术交往中,张岱年先生与冯友兰先生关系最密切。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兄长张申府的引介下,张岱年与冯友兰初识。1935年,经冯友兰和张申府的介绍,张岱年与冯友兰先生的堂妹冯让兰结婚。在学术方面,张岱年先生说:“我在哲学思想方面,与吾兄是同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则与冯友兰先生同调。”<sup>[6]463</sup>冯友兰先生去世后,张岱年先生先后撰写《悼念冯友兰先生》、《哲人其萎 遗范永存——沉痛悼念冯友兰先生》、《冯友兰先生二三事》、《怀念冯友兰先生》等文章,以表达自己对冯友兰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学

术敬仰之意。张岱年先生认为,冯友兰先生著《贞元六书》的思想体系,总起来说,可以称为“新理学”体系,从其内容来看,是中国的程朱理学与西方柏拉图主义的结合。“冯友兰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冯先生在50年代转向唯物论,从主张‘理在事先’转到‘理在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称赞冯友兰晚年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当代的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成就。”<sup>[6]561-563</sup>张岱年先生认为,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转变即由唯心主义哲学立场转为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历史意义:“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强大的说服力,一方面也表明冯先生追求真理的虚心态度。”<sup>[6]485-486</sup>

应该说,大陆现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及冯友兰的学术思想,对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哲学体系建构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张岱年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立场和学术研究价值取向而没有倒向现代新儒家的学术阵营。但是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大陆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作了高度的客观评价。

**5.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张岱年先生虽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专业研究,但在学术研究中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融合。张岱年先生说:“儒学有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不相合的,但也有一部分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可以相合和相互补充。”<sup>[9]</sup>又说:“中国古典哲学中有许多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相近之处。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唯物主义的 tradition,又富有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是应该深入理解的。”“在中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生根后才能开花结果;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密切结合,才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sup>[1]159</sup>从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旨趣来看,张岱年先生既阐释和弘扬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又着力批判和发掘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的唯物论和辩证思维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有学者指出:“张岱年先生在30年代就致力于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去发掘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的工作,在40年代写的‘天人五论’中,又力图建构一个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理事’、‘心物’、‘知实’等问题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sup>[10]</sup>张岱年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另一方面开拓传统儒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路径。从而打破现代新儒家研究儒学的理论架构和方法路径的窠臼,开辟了儒学研究的新境界,为弘扬中华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作出了卓越贡献。

从文化向度来看,现代新儒家主张“儒学复兴论”,即主张以儒家文化为本位,汲取西方文化优秀成果,试图运用“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模式融合中西文化,进而创建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家文化体系。与“儒学复兴论”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既克服“全盘西化论”和国粹主义的中西对立的文化观偏失,又超越了“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的体用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主张在批判地吸收各民族文化的优点的基础上,创立一种符合社会发展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它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

当代著名学者方克立先生将“文化综合创新论”进一步提升为“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其中,“魂”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精神指导原则”,代表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渗透在当代中国文化的新创造之中的“活的灵魂”;“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是体现和服务于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中华文化;“用”则是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或优良成果。<sup>[11]</sup>2007年4月,方克立先生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上再次指出:“综合创新文化观所要解决的就是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问题和中、西、马关系问题。面对古今中外问题,我曾将它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

句话;面对中、西、马关系问题,去年我又讲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几句话。我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说是符合张张先生对文化体用问题的全面看法的。”总之,“马魂、中体、西用”说,是将文化体用论与民族主体性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对张岱年先生“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重新解读和理论提升,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系统表述,其终极价值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6. 结语

判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属于何种哲学派别、归属何种学术流派,不在于其思想包含多少种成分,而是看其主要的学术价值取向或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目标。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来看,张岱年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学术研究的主要倾向或主要内容来看,张岱年先生无论是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还是创立“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模式,抑或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都侧重于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从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来看,张岱年先生致力于从文化视角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学术价值取向在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致力于儒家文化研究,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拓儒学研究的新境界。但张岱年先生开创的学术派别显然不属于现代新儒家。张岱年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 [参 考 文 献]

- [1] 张岱年全集:第7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2] 陈来. 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 刘鹤培. 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4.
- [4] 张岱年全集:第6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306.
- [5] 宋志明. 张岱年对现代新儒学的推动[M]//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2013(1):246.
- [6] 张岱年全集:第8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 [7] 张岱年. 关于新儒学研究的信[J]. 哲学研究,1990(6).
- [8] 张岱年. 通往智慧之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8.
- [9] 张岱年. 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序言[J].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学

报,1998(1).

[11] 方克立. 关于文化体用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2006(4).

[10] 陈来. 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谢光前)

## On Zhang Dai-nian and Modern Neo-Confucianism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Mr. Zhang Dai-nian

CHI Cheng-y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Nanjing Railwa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Mr. Zhang Dai-nian dedicates himself to Confucian studies, but he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revival theory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Neo-Confucianism. Although he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era Confucian studies, Mr. Zhang Dai-nian makes it clear that he is not a Neo-Confucian. About the existence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Mr. Zhang has gone through a cognitive process from negative to affirmative and he emphasizes that the study of Neo-Confucianism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He kept a deep relationship and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mainland Modern New Confucians like Xiong Shili, Liang Shuming and Feng Youlan, and spoke highly of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s. Neo-Confucians adopt research standpoint of idealism, value orientation of making new by going back to tradition and cultural dimension of reconstructing Confucianism system. Different from that, the theory of Synthetic Innovation of Culture by Zhang Dai-nian studies Confucianism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guiding of Marxism and advocates combining the excellent resul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ith innovation to construct new socialism culture with Chinese manners.

**Key words:** Zhang Dai-nian; Modern Neo-Confucianism; Research of Confucianism

---

(上接第 16 页)

## On Ethical Dilemma of“Seeing”and Its Reflection ——My Opinion on the Allusion“to exchange a sheep for an ox”in *Mencius*

CHEN Lin

(Philosoph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encius has demonstrated the rationality in the allusion “to exchange a sheep for an ox” by saying that “seeing the cattle but not the sheep”, which confused the latter scholars in interpreting “to exchange a sheep for an ox”. Chu Hsi has spoken up for Menciu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at “benevolent skill”, “reasoning hasn’t been formed” and “man is different from animal”. In fact, “Seeing” in the allusion “seeing the cattle but not the sheep” is to emphasize the function of compassion in being nice with others. In this sense,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ethic in “seeing the cattle but not the sheep” is how to view the function of moral emotion in people’s ethical life. We think that in modern society people should not base their ethical life on compassion, instead, they should base it on a whole set of ethical standard system. So, moral education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cquired cultivation and add moral reason into people’s moral emotion through systematic indoctrination. By this way, people will form their own conscience in which moral reason occupi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Key words:** To Exchange a Sheep for an Ox; Seeing; Moral Emotion; Moral Reason